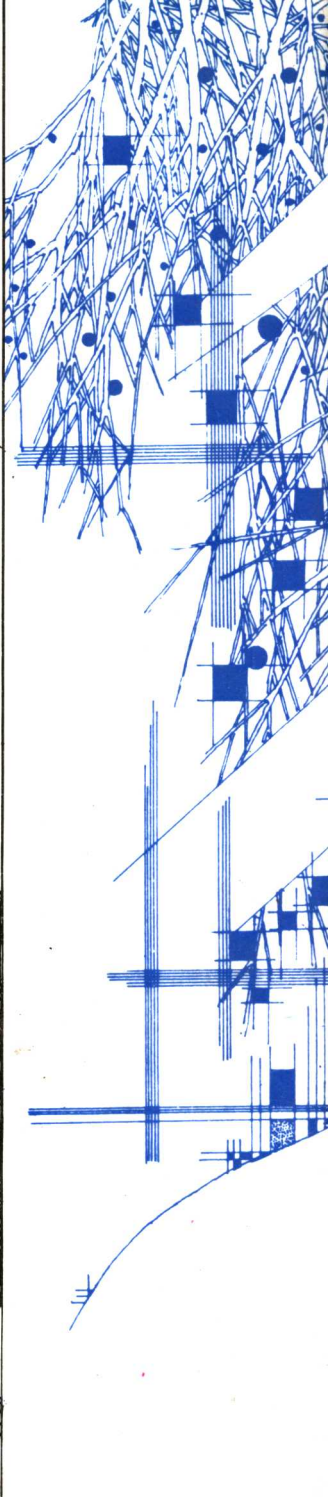


明小品三百篇

● 胡义成选评

○ 西北大学出版社



明小品三百篇

胡义成 选评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1 号

明小品三百篇

胡义成 选评

*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

新华书店经销 富平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75 字数 396 千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0

ISBN7-5604-0412-X/I·65

定价：(平) 8.50 元
(精) 12.50 元

序 言

今年春节，胡义成同志来看我，从粉碎“四人帮”之后政治、经济等方面出现的大好形势，谈到文艺创作的繁荣，谈到古典文学和中国美学史研究工作怎样才能赶上新长征的步伐。谈得很投机，很热火，彼此都敞开思想，无所顾忌。我深深地感到，和“十年动乱”期间相比，什么都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

在谈到古典文学和中国美学史研究工作应该打破哪些禁区，多方面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精神生活需要的时候，胡义成同志说，他正在搞一册明人小品选评，要我帮忙。我说：“很好！这个忙我愿意帮。本来可以多帮一些，可是……”

50年代，我连续好几年讲授元明清文学，对于明代散文发展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60年代前期，我又对“公安派”的理论、创作、师承、影响等问题，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且用了将近两年的课余时间，完成了30多万字的《三袁年谱》初稿。这部稿子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文学的许多方面，对于选评明人小品，也是很有用处的。

“能把这部稿子借给我吗？”

“如果还在我手边的话，当然愿意借给你。可是，它早在‘文革’初期就被‘东风红卫兵’‘抄’去了！这部稿子是用上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字样的直行稿纸抄写的，想来它还在人间。我一直希望有哪位好心的同志还给我。”

“唉！真可惜！”

这一声叹息，唤起了我的回忆……

当我从回忆中清醒过来，冷静下来的时候，对胡义成同志说：

“是很可惜，然而可惜的岂只是丢掉了那部手稿和那些资料！‘十年动乱’嘛，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从杰出的才华到宝贵的生命，从纯洁的心灵到高尚的道德，从民族的荣誉到人类的尊严，从天文数字可以计算的物质财富到天文数字无法计算的精神财富，我们被劫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弥补往日的损失，夺取未来的胜利。你就先把明人小品选注搞出来吧；我虽然在‘十年动乱’中丢掉了那部《三袁年谱》和大量书籍，学业也荒疏了，但仍然可以帮助你。”于是，我给他开了必要的书目，谈了搜集有关资料的线索，后来又共同商定了选目。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他就在以前初稿的基础上，完成了全部注评工作，写出了将近两万字的《前言》，真够得上“加倍努力”了！

我国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学，在戏曲小说异军突起之前，主要的可分为两大类——诗歌和散文。在戏曲小说兴盛之后，诗歌和散文的创作仍然历久不衰，就其数量而言，远远超过了戏曲小说。然而在解放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如果说对于诗歌、戏曲、小说还比较重视的话，那么对于散文，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翻一下现有的几部文学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对于明代的散文，只不过略提几笔而已。胡义成同志在《前言》中提到明人小品一直被人们侧目而视，其原因在于对30年代关于明人小品的论战作了片面的理解，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除了这一点而外，是不是还有原因呢？我认为有的。要不然，为什么对于其他朝代的散文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呢？

原因何在，需要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和古典文学及美学研究工作者共同探讨，作出中肯的回答。这样做，对于我们更好地继承文学遗产，使社会主义文艺园地里的散文之花开得更加芬芳艳丽，是大有帮助的。

原因当然很多，我以为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教条出发，拿

上关于文学的定义的框子去套我国的传统散文,可能是原因之一。

文学理论教科书告诉我们:“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基本特征。”而“文学的形象”,所指的又“主要是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从文学的角度讲散文,当然得对文学的散文和非文学的散文加以区别,因而也就不能无视文学的定义。然而把定义看成僵硬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却不一定能够解决纷纭复杂的实际问题。拿上文学定义的框子硬套我国的传统散文,勉强套上的,就作为文学的散文略加论述;套不上的,就统统排除在文学的殿堂之外,这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这里似乎应该考虑两个实际。

首先是民族传统的实际。比如希腊文学,一开始就是史诗和戏剧,运用上述的定义去衡量,当然是可以的。如前所说,我国在戏曲小说兴盛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主要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散文。就诗歌说,除了《诗经》中勉强可以看作史诗的《公刘》、《生民》和此后有数的几首篇幅较长的叙事诗而外,大量的还是抒情诗。既然如此,那么不从我们民族文学传统的实际出发,却用一成不变的文学定义的框框去套,又怎能不闹“削足适履”的笑话呢?

其次是文学样式、文学体裁的实际。和小说、戏剧相对而言的散文这种文学样式有它自己的特点。作为文学的一个品种,它固然具有形象性,乃至典型性,却不像小说、戏剧那样能够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如果创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那它就不是散文,而是小说了。

在我国古代,把诗歌以外的一切文章都叫做文,包括散文、韵文和骈文,也包括应用文、学术文和政论文。对于这包罗万象的文,我们应该区分哪些是文学性的,哪些是非文学性的。只要是文学性的,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那么不论是散文还是韵文和骈文,都应该纳入文学的宝库,作为文学研究和文艺欣赏的对象。还有,我们

通常是把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四大类来论述的，为了论述的方便把韵文、骈文也归入散文这个大类里面，似乎也未尝不可。

那么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算文学性的散文呢？简单地说，这条件应该是：言之有物，而又具有一定的艺术性，能够给读者以艺术感染和美学享受，并在美学享受中陶冶性情，开拓心胸，使其精神境界、道德修养、认识水平都得到提高。

艺术性的内涵十分丰富。就散文的艺术性而言，首先要有一定的形象性。

散文拥有各种各样的体裁，不同体裁的散文，其形象性也各有特点。例如《左传》、《史记》、《汉书》等书中的人物传记，即通常所说的史传文，它们本来是历史著作的组成部分，因而首先要求历史的真实性，不一定都有艺术性。只有那些具有艺术性，能够使人受到艺术感染、得到美学享受的，才可以列入文学性散文的范畴。但即使如此，它们仍然不能违背忠实地记录历史事件的要求。严格地说，那是历史与文学交叉处的东西，是史与诗的结合。鲁迅称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针对史与诗相结合的特点而言的。如果首先不是“史家之绝唱”，那就丧失了历史著作的价值。因此，即使像《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那样既有生动的环境描写，又有精湛的人物性格刻画，却仍然不能说创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当然，它的形象很生动，也有一定的典型性，但那典型性来自司马迁对项羽及其历史环境本身所具有的典型特征所作的真实描写，而不是来自对生活的艺术概括。

又如《水经注》、《永州八记》、《徐霞客游记》等等，通常称为游记散文，它们的形象性来自作者对于社会状况、自然景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气候物产、乃至政治、历史等等的真实而形象的描述，其中也可能有人物形象，但人物描写并不是贯穿始终的主要内容，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主要是社会图画和自然图景，而不是典型环

境中的典型人物。

又如《守株待兔》、《愚公移山》和柳宗元的《三戒》之类的寓言，或取材人事，或通过动物的拟人化创造形象，但那形象的创造，其目的在用以寄寓生活真理，实质上起着一种譬喻的作用，和戏剧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很不相同。

散文是一种便于书写的文体，因而形式灵活、体裁多样；翻一下《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之类的著作，名目之繁多，简直使人眼花缭乱。但除了论说文之外，其他体裁的散文都可以有这样的形象性，那是不难理解的，因而这里有必要谈谈论说文。

有人把散文分为议论、记叙、抒情三类，这虽然简明，却不很科学。因为议论、记叙、抒情这三种因素尽管在不同的散文中有所偏重，但很难孤立存在，而往往是互相结合的。如果完全排除了、或者过多地排除了叙事、抒情的因素，完全是、或者基本上是抽象地发议论、讲道理，那就很难获得形象性。与此相反，虽然以发议论、讲道理为主，却感时伤事，夹叙夹议，叙事活灵活现，议论充满激情，那自然就具有形象性。例如《庄子》，当然以发议论为主，但正如林云铭在《庄子因》中所说：“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只见云气空蒙，往返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又如苏洵的《六国论》，分明是一篇论说文，但论的是六国以赂秦而亡，悲的是北宋以赂而弱，请看如下一段：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

寓说理于叙事，形象鲜明，感情激越，能够使读者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把这样的作品摒弃于文学遗产之外，显然是不公允的。

在以先秦诸子为代表的哲理文、以贾谊的《陈政事疏》为代表的政论文和以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为代表的史论文中，由于把议论和叙事、抒情结合起来而获得艺术形象性的作品为数很多，这都是文学散文中的珍品，不容忽视。

与形象性紧密联系的是抒情性。

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进步的、健康的、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学性的散文也不例外。但光有思想，像纯粹的理论著作那样，就不能算文学作品。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首要标志是有无艺术感染力。这艺术感染力，来自作品中具体可感的形象，也来自洋溢于字里行间的激情。我国古代文论家中的许多人都论述过文学作品“以情动人”的特点。19世纪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更强调指出：“用艺术家所体验的感情感染人”是艺术的主要特征（《艺术论》第111页）。诗歌、戏剧、小说如此，文学性的散文也如此。早在南北朝时期，萧绎就在《金楼子·立言》中说到具备了“流连哀思”、“情灵摇荡”的条件，才“谓之文”。明代公安派的袁宗道在《论文》中更尖锐地指出：“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从而写出了由现实生活激起的真感情，文章就具有个人特点；相反，如果像“戏场中人”那样，“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就“不得不假借模拟”，和别人的作品“雷同”了。这些话都讲得很确切。

任何体裁的散文，都必须既有形象性，又有抒情性，能够使读者受到一定程度的艺术感染，才能进入文学之林。《左传》中的许多篇章“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涕洟；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刘知几《史通·杂说上》），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同时，“中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谗诈则欺诬可见，……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同前），具有浓烈的抒情性。正因为这样，才无愧“史传文学”的称号。欧阳修《五代史》中的《宦者传论》、《伶官传序》之类的作品，在叙述历史

事实，描绘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发议论、抒怀抱，吊古伤今，忧时念乱，真所谓“遇感慨处便精神”，既是卓越的史论，又是优秀的文学散文。

我国古代的散文作家和评论家，对于散文创作在语言、音节、结构等方面的要求，也发表过许多很好的意见。在有了形象和抒情性的前提下做到语言优美、音节和谐、结构谨严而又富于变化，就可以加强艺术感染力，提高散文作品的艺术性。

以上就如何区分文学性的散文和非文学性的散文谈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如果这些看法还大致不错的话，那么在我国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著作里，文学性的散文并不罕见，其总量相当可观。问题在于我们需不惜付出艰苦的劳动，去做爬罗剔抉的工作。

谈了有关文学性散文的问题，就便于讨论有关小品文的问题了。

什么是小品文，说法不一。新编《辞海》把“小品文”和“杂文”、“随笔”、“游记”、“传记”等等并列，解释说：“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种。特点是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地讲一些道理，或简明生动地叙述一件事情。中国古代即有这种体裁，明清更为盛行。现今的小品文因内容不同，一般分为讽刺小品、时事小品、历史小品和科学小品等。”（《文学分册》第19页）

把小品文和杂文、随笔、游记、传记等等并列，说它的特点是“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地讲一些道理，或简明生动地叙述一件事情”，这就大大地缩小了小品文的天地，值得商榷。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说：“唐末诗风衰败，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激愤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藪》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

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翻阅《皮子文藪》,就知道它包括了碑、铭、赞、颂、论、议、书、序等许多体裁的作品,其内容“上剥远非,下补近失”,触及历史和现实的各个方面。《谗书》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也不限于一种或几种体裁。至于明末的“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的小品,也显然包括像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等许多体裁的作品在内。可以看出,鲁迅是把小品文的范围看得很宽的。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又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里所说的“散文小品”,当然包括了鲁迅自己的杂文集《热风》中的41篇作品,可见鲁迅是把“小品文”作为“杂文”的同义语使用的。那么什么是鲁迅心目中的“杂文”呢?请看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的解释: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

鲁迅的16本杂文集,就是“按作成的年月”,把分属于各种文体的作品“都夹在一处的”。冯雪峰在《谈谈杂文》中曾说,杂文“决不是某种文体或笔法所能范围和固定的”,正和鲁迅的意见相一致。

既然小品文在体裁上无所不包,正像文学性的散文在体裁上无所不包一样,那么“小品文”和“文学性的散文”这两个概念是不是完全相等?或者说,所有的“文学性散文”,是不是都可以叫做小品文?

在《小品文的危机》中,鲁迅把那些“吟风弄月”的“小品文”比做“小小的镜屏”之类的“小摆设”,而把“生存的小品文”称为“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匕首”和“投枪”。显而易见,这里正突出了“小品文”篇幅“小”的特点。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所有短小精悍的文学性散文,都可以算做小品文。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从

有明一代270余年间的散文创作中,选一部小品文集,则可供选择的作品就随处可见,而不是寥若晨星了。

在初步研究选目的时候,胡义成同志在哪些文章才算小品文这一点上,持郑重态度。经过商讨,他参考我的意见,放宽了选材的范围。但我的意见很可能是荒谬的,如果入选的某些文章不能算小品文,那完全是我的过错,我殷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霍松林

1980年中秋写于见山楼

胡义成同志的《明小品三百篇》即将出版,仍然要用我的序。这篇序,是12年以前写的,曾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过。找出来重读,第一二段赞颂新形势的激情,唤起了我欢欣的回忆。那时候,我虽然刚从空前劫难中熬出来,种种覆盆之冤才彻底昭雪,却已经预感到否极泰来,改革开放的东风,必将给神州大地带来繁花似锦、永不凋谢的春天。因而从我们的本职工作着眼,考虑“古典文学和中国美学史研究工作怎样才能赶上新长征的步伐”,“多方面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如今,14年的改革开放已使我国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综合国力都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全国人民正在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奋勇开拓,实现新的历史飞跃。物质文明建设的迅猛发展已经为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与义成同志12年以前考虑的问题,显然应在更高的层次上缜密考虑了。我已年逾古稀,而义成同志正当壮年,希望他在这方面做出更大成绩,无愧于伟大的新时代。

1992年秋 霍松林写于唐音阁

前 言

千霜万雪，受尽寒磨折。赖是生来瘦硬，浑不怕，
角吹彻。

清绝，影也别，知心惟有月。原没东风性情，如何
共，海棠说？

——（宋）肖泰来《霜天晓月·梅》

人们一提起中国的文学遗产，往往想到或说到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话本等等。这当然是对的，但总使人感到不全面。如果说，可以把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话本等等，譬之为我国历史上各时期文学珍宝箱中最宝贵的珠玑的话，那么，应当看到，在这珍宝箱中，还有其它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精品。这些精品，虽然比不上那些最宝贵的东西，但也是各具特色，璀璨夺目，晶莹透亮，与那些最宝贵的珍品彼此辉映，互相衬托，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遗产，呈现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富有景象。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即以明代而论，话本小说当然是文学创作中的佼佼者；但在这佼佼者之旁，还有明代小品文（以下简称“明小品”）——这也是一颗硕大华艳的明珠。它宝气四射，历世难灭，不可忽视。

（一）

小品文并不是明代独家特产。从时间上看，它是一切文章的始基；从结构上看，人类文学文字信息均含着小品“基因”。它在我国的起源，可以说，几乎和文字一样古老，和文学一样高龄。四五千年

前的那些卜辞,其中许多不仅短小,而且隽永有味,妙理玄奥,未尝不可以被看成我国小品文的滥觞。到了春秋战国以迄秦汉,小品文便进入了“豆蔻年华”。此无它,盖因华夏诸贤与地中海岸的古圣,思维模式有别也^①。周秦百家诸子的大部分书典,例如《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墨子》、《商君书》等,以及两汉学者的某些著述,例如杨雄《法言》,刘向《说苑》、《新序》,桓谭《新论》和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一些篇什,王充《论衡》的某些段落等,严格地按文体来说,基本上都是小品文的汇集或连缀。鲁迅甚至认为,“《史记》里的《伯夷列传》和《屈原贾谊列传》,除去了引用的骚赋,其实也不过是小品”^②。由于周秦诸子思想和文风对后代的深远影响,以及小品文本身作为文学信息之“基因”的品位,包括它所具有的精悍短小而蕴藏哲理的特点,可以说,我国历代有才能的文人学者,多多少少均有“小品味”。作为一种自由活泼的短文,作为讲道理深入浅出、行文中夹叙夹议的散文体裁,小品文一直是我国文坛上的一颗可爱的珍宝。自从东晋十六国时期来我国的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对其所译《般若经》较简略短小的译本定名《小品般若》以后,小品文作为散文中的一种特殊体裁,就受到了我国文论家和文人学者更加自觉地研究应用。词手骚客在自己作品前面所加的短序说明,学者史家在撰述中所积存的随笔札记,文论家的诗话曲语和眉批小跋,经学家经典解释中的某些精彩片段,书册画幅上的精当题辞和跋语,野史轶事和笑话神话的结集,僧众道士们参禅论机的语录警言,以及短槽情函、揭帖批复、命令便条、日记杂感、游记小题之类,甚至某些研探金石古董的短文、科学实验中产生的断想笔录、行家里手(如术士,大夫,画家,艺人,艺匠等)谈论心得体会

① 据刘长林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研究,中国人的思维长于感性形象,类乎女性特点,大异于西哲。

②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

的百字文等等,大都是“小品味”很浓烈的东西。其中许多篇什,本身就是标准而绝妙的小品文。因此,在我国文学遗产的宝库里,积存着不少小品文的典籍和作品。例如,三国魏国竺子叔编撰的笑话专书《笑林》,西晋张华记载古代琐闻逸事的《博物志》,东晋葛洪叙述古代传说神仙故事的《神仙传》和采辑西汉遗闻异事的《西京杂记》,裴启记汉魏社会上层人士言谈轶事的《语林》,南朝刘义庆着重记录晋代士大夫言行趣闻的《世说新语》,梁宗怀记载荆楚一带风土人情的《荆楚岁时记》,北魏杨衒之之追叙北魏盛时洛阳佛寺兴隆景况的《洛阳伽蓝记》,隋代侯白撰著的笑话集《启颜录》,唐代张鷟的当代史小品集《朝野僉载》,封演的当代风俗小品集《封氏闻见记》,崔令钦的音乐札记《教坊记》,刘肃记录当代政治思想史实的《大唐新语》,段成式的杂录随笔《酉阳杂俎》,韦绚追述当时文坛掌故的《刘宾客嘉话录》,孙棨描述长安城北平康里歌妓生活的《北里志》,唐末罗隐的杂文《谗书》以及皮日休的《皮子文藪》和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五代王定保详载唐时科举轶闻的《唐摭言》,北宋孙光宪描述唐五代社会风貌的《北梦琐言》,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沈括的科学小品集《梦溪笔谈》,苏轼的杂感小品集《志林》,南宋张邦基的政界随笔《墨庄漫录》,叶梦得的文论小品《避暑录话》,洪迈的资料丰富的《容斋随笔》,陆游的杂记集子《老学庵笔记》,岳飞后裔岳珂的历史小品《桎史》,元人夏庭芝关于当代戏曲小史的随笔《青楼集》,元末陶宗仪的文物小品集《南村辍耕录》,等等。隋唐以降,八大家成熟的散文,向被认为是“古文”典范,两宋理学家,统被视作“枯文”鼻祖,其实,这些人也都沾有“小品味”。韩愈的《杂说》、《送董邵南序》;柳宗元的《三戒》、《黑说》;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伤仲永》等等,均是小品文中的上乘。苏轼的《志林》,“实开晚明小品一派”^①;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确为我国诗评新种。两宋理学家

① 吕淑湘《笔记文选读·志林》。

中的朱熹，周敦颐以及二程兄弟，文集中也有不少简短活泼的“口语小品”。至于唐宋诗词名家，则更带小品之风。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秋于敬亭送从侄崱游庐山序》；白居易的《荔枝园序》；刘禹锡的《陋室铭》；辛弃疾的一些诗词小序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小品文。不过，以上所说，就作者而言，除周秦诸子外，其他人毕竟只是有“小品味”或者这种“味”较浓，就作品而言，毕竟未在当时文坛上占据散文领域的统治地位并发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因此，只能说小品文成长发展着，经历“豆蔻年华”而并未到达成熟期。汉代以后，由于社会文明加速进步，人们思维和交往日益发展，需要有比小品文更能表达系统、深刻和复杂思想的诸种散文文体，而策论、传记、论文、话本等，正好适应了人们的各种需要；因而小品文也只能从周秦时期的“散文之王”退而居于从属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唐宋古文等等是在文体上对小品文的否定。

显然，作为一种文体，小品文既有自己的长处，同时也有自己的短处。无论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讲，或者是从文体变迁的规律研究看，小品文及其历史发展规律，均是值得注目的一个问题。

本世纪30年代，谢六逸曾把小品文从“小”和“品”两方面来界定，认为小品文之“品”，“是指小品文这种文体所特有的优点而言”^①。与此同时，叶圣陶则指出：“一般地说，小品文大多是篇幅短小的文字。除此之外，小品文实在指说着某一种文体”，它对立干“讲义体”或“教科书体”；后者的内容无非是“人生经验的公式化跟化石化，把人的感情赶到露不得嘴脸的角落里去，只是板起一副似乎理智的面孔，告诉人家一些好像同人家全不相干的事”，因之，“第一是引起厌倦，第二，无论讲的什么，总使人有一种毫不亲切的感觉”，而前者则“是不搭足空架子的：作者见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

① 谢六逸《小品文之弊》，见陈望道编《小品文和漫画》，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217页。

甚么”，它“不只是提供一些概念的：作者怎么得到这一些概念的过程，也在文字里精密地叙述出来，有时还用了画家的画笔似地描出一些生动的印象”；它“是抱着一种亲切的态度的”，与读者达到一种感情和理智的交流。叶老还据此提出，对于小品文而言，“小不小到底不是顶要紧的条件，一部巨大的传记，一部很长的旅行记事，切开来，固然是许多篇的小品文，合起来看，称为文学的散文也满适当”；“精粹的小品文是一个极端，好比最深色；讲义体中间的尤其坏的是另一个极端，好比最淡色。在这两极端之间的就只有程度的差异，越接近小品文的越是文学，越远于小品文的越不是文学”^①。叶老这种界定，一是从“小”和“品”两方面把小品文对立干非文学非感情的“讲义体”（依我看，似可再加“策论体”、“论文体”等等。叶老是文学家，以情感性作文体优否的尺度，可以理解，但未可为定论。讲义、策论、论文等，各有不同功能，不能以情感性苛求之），在区别中抓住了小品文的特征；二是表述了一种灵动的“小品谱”概念，使小品文的界说不致陷入僵定之中，因而是很值得重视的。当时，作为鲁迅先生学生的唐弢，还强调小品文“其实就是现在一般人都浑称的杂文”^②。把上述种种见解加以综合，应当说，小品文区别于其它文体的特征，大体也就清楚了。小品文在我国源远流长，是由它的这些特征所决定的一种文化现象。鉴于人类认识总是从感性推至理性，所以，小品文作为感性的文字载体，总是在各民族文明的滥觞期出现繁荣；当人们需要带着肯定性的或否定性的感情来表述自己的某种见解，而这种表述又不必要或不可能在理性上达于相当成熟和圆到的时候，小品文的存在和发展也便成为历史的必然。感性不灭，小品不灭。

不过，在我国，小品文被古文排挤出“散文之王”地位的史实，

① 叶圣陶《关于小品文》，《小品文和漫画》第31～35页。

② 唐弢《小品文拉杂谈》，同上第49页。